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 百年发展史

陆 华·著

PUTONGGAOXIAOGUOFANGJIAOYU
BAINIANFAZHANSHI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江苏省社科基金存期资助项目“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百年发展史”(15HQ008)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 百年发展史

陆 华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内容提要

本书全面梳理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以来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在百余年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和作用影响等，旨在阐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教育历来都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青年大学生国防观念和国防意识的强弱既会影响个体的综合素质，也会影响着其承担国防义务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进而关系到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大计，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意义重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百年发展史 / 陆华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641-7104-9

I. ①普… II. ①陆… III. ①高等学校—国防教
育—教育史—中国 IV. ①G641. 8-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6420 号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百年发展史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328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7104-9
定 价	32.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传真): 025-83791830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近代学校国防教育的滥觞	9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教育救国思想的提出及初步实践	9
第二节 清末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影响	14
第二章 民国初期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	26
第一节 军国民教育方针的提出及实施	26
第二节 一战前后的社会思潮及其影响	30
第三节 一波三折的军国民教育	35
第四节 民国初期的童子军教育	40
第五节 孙中山首倡“国防教育”	43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	49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组织领导	49
第二节 普通高校以军事教育为主体的国防教育制度化建设	50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与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	60
第四节 全面抗战前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概况	68
第五节 全面抗战时期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	78
第六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童子军教育	86
第七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学校的国防教育	89
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学校国防教育	93
第一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学校国防教育	93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年)根据地学校国防教育	97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解放区国防教育概况	106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	109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的转型性发展	109
第二节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	112
第三节 第一部《兵役法》和普通高校早期学生军训试点	117
第四节 普通高校以民兵训练为特色的国防教育	123



第六章 “文革”时期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	131
第一节 “文革”初期高校的短期军政训练	131
第二节 “三支两军”中的学军运动	133
第三节 蓬勃发展的国防体育运动	136
第七章 改革开放后普通高校的国防教育	142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高校国防教育工作的逐步恢复	142
第二节 第二部《兵役法》与高校军训试点启动	145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高校学生军训试点阶段基本情况	148
第四节 20世纪90年代高校国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159
第五节 试点阶段国防教育的法制化建设	165
第八章 新时期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创新发展	168
第一节 学生军训工作结束试点走向普及	168
第二节 以课程建设为平台全面推进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发展	172
第三节 以学科建设为牵引努力构筑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	179
第四节 以国防教育活动为抓手拓展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181
第五节 以军民融合为指导完善普通高校军事人才的培养机制	183
第六节 以强军梦为召唤推进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189
主要参考文献	192
后记	195

导 论

时人赋予当代大学四个方面的神圣使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1）人才培养。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高等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着力增强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科学研究。高等学校既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又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高水平科学研究是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基础。（3）服务社会。高等教育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4）文化传承。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上述四个方面归根结底，又紧紧服从和服务于民族兴亡和国家昌盛的中心任务。

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现代高等培养的对象正值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刻，更应具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意识，近代大学诞生之初就直接担负起了富国强兵、实现民族自强的历史责任。作为世界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在面对普鲁士遭受拿破仑占领的残酷现实中，认识到需要用教育来拯救国民灵魂，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改革来提高德意志民族的素质和爱国觉悟。学校教育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必须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才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凝聚力，从而真正为国家带来强盛和繁荣。他所领导的普鲁士教育改革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人力资源，用事实证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发端于民族国家危难之际的国防教育从此也就成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是在中国从积贫积弱的近代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中华民族遭受着一次又一次外国列强的入侵与欺凌，同时又面临着内部政局的动荡与调整中，高校国防教育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国难当头的岁月为增强高校大学生的国防意识、提升民族凝聚力、最终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60 多年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增添了活力，成为培养高素质国防后备力量的重要来源。

一、国防教育解读

笔者以为，所谓国防教育简而言之是指为建设和巩固国防而进行的教育活动。国防自



国家诞生之初，便有了存在的理由，防务是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手段。在漫长的人类社会进程中，国防的概念与内涵随着国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而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国家对维持其防务所需能力与手段的认知也在不断提高。1997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对国防进行了科学界定：国防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这一定义指明了国防的对象为外部的侵略和内部的武装颠覆，国防的目的是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国防的手段以军事为主，还包括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诸多非军事手段。显然，国防教育是建设与巩固国防、实现国防功能最大化的有效手段。

国防不同于军事，国防学也不同于军事学。德国的国防科学家班斯(Ewald Bans)曾说过：“国防科学并不就是军事科学。它并不教导将领们如何打仗，也不教导部队的军官如何训练新兵。它的课程，首先最要紧的是讲给全体人民听。它的目的在于训练群众具有英雄和战斗的心理，使他们了解近代战争的性质和先决条件。它教我们知道各个国家和各种人民(特别是本国和邻国)的交通和智力，一切旨在将来从事战争以保卫国家生存的时候造成最有利的条件。国防科学是在综合运用每一方面的人类思想与人类努力，以期增加我国人民的防卫力量，国防科学产生于知识这一门，可是逐渐成长为一般的精神势力，使一切知识都趋向于同一的国家目标。”^①民国时期著名的军学泰斗杨杰也提出：“国防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它脱胎于军事科学，却和军事科学两样。它是综合一切科学的科学。将一切科学组织起来，为达到国家生存发展的目的而协同动作。而军事科学的任务是在发展战争理论，研究战术战略。”^②因此，国防教育亦不同于军事教育。军事教育是指以教育科学的一般原理、原则为依据，对现役和预备役官兵进行军事理论教育和实践训练。其根本任务是根据建军原则和战略方针，通过有组织的军事教育和教学，引导受教育者掌握现代战争基本知识，熟练地掌握武器装备与军事技能，培养严格的纪律、健壮的体魄和良好的作风。应该看到，军事教育强调对象的指向性和内容的专业性，有时仅指军事系统内组织的对现役部队官兵进行的教育活动和对教育科学规律的研究。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兵农合一、军民融合的制度与特点，军事教育的对象在实践中宽泛了许多，特别是战时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已成惯例。而当国防教育这一现代概念出现时，两者之间的内涵与外延还会时常交叉。长期以来，人们会混淆军事教育与国防教育，甚至在一定语境下等同使用。

国防教育泛指国家为使公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学习必要的军事技能，激发其爱国热情，使其自觉履行国防义务所开展的教育活动。它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养的重要途径。从教育对象上看，国防教育相对于军事教育而言要宽泛得多，它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全体公民。从教育目的上看，国防教育除了使公民掌握基本的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外，更多的是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增强其国防观念，使其能够自觉地履行国防义务。正如学者们所言，国防教育的实质主要在于使教育者能够回答三个问题：“(一)国家需要我做些什么？(二)我能够为国家做些什么？(三)假如我能够

① 杨杰《国防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年 6 月版三版自序第 2 页

② 杨杰《国防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年 6 月版三版自序第 2 页

做国家需要我做的事情,我将怎样做法?”^①国防教育能够为专业化的军事教育提供强有力群众基础和浓厚的国防氛围,它既是一个历史阶段国防形势和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全体民众爱国主义精神和行为的集中体现。国防教育这一概念出现于二十世纪初,但其目的、内容、形式、手段等则早在国家诞生之初便伴随着国防的需要与教育的发展应运而生了。2001年4月28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中对我国当代国防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方针与原则、领导及其职责、对象及其要求、保障和法律责任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都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防教育的核心是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主旋律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可表现为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但都会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以一种力的形式爆发出来。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R.尼布尔曾说过,民族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仅拥有其他群体所缺乏的警察力量,而且能够利用最有效力、最有生气的象征把自己的主张灌输到个人的意识之中。无论是在国家的政府机构中,还是在国家的各种礼仪中,特别是在国庆大典的阅兵进行中,民族以自己统一和伟大的象征激起了公民的敬畏。人们对自己所熟悉的风土人情及其经历的爱慕和虔敬,往往会使他们在记忆深处给这些东西戴上一个神圣的光环,并以爱国主义的方式表达出来。“由于单纯的想象将无处不在的大自然转化成了仁慈的国家赐予其公民特别祝福的一个象征,于是爱国主义情感在现代人灵魂中达到了一种如此绝对的效力,以至于国家能够任意使用个人忠诚所赋予的权力以达到任何目的。”^②在任何时候,民族精神培育都是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在黑格尔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其所以有力量是根源于它所依存的伦理世界:一个民族对其自身力量与安全所持的深信不疑的确定性,即确信它的誓约能把全民族团结成为一个人。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危急关头、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民族精神总能振臂一呼,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当中,成为挽救国家、挽救民族的支柱。这时的民族精神已成为一种民族自觉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本身直接具有火的力量的主体”。^③在和平建设时期,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使当代大学生具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从而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保卫者和接班人,已然成为新时期高校国防教育的任务所在。

二、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及其发展史研究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是指在普通高校开展的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目的、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国防教育课程建设或国防教育活动为平台、以提升学生综合国防素养为价值追求的一系列教育活动。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发展受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变化的影响,但更受制于高等教育的思想、理念、技术、水平等因素,特别是高校对学生国防素养培育重要性的认知和实际情况。作为一种集体能—智能—情感—学识为一体的综合教育范畴,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理应成为高校全体师生员工的教育自觉,更应成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基础。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如果以清末“癸卯学制”中提出的兵式体操开始,

^① 杨杰《国防新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6月版三版自序第3页

^② [美]R.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③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3月版第45页



至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期间经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一是指 1904—1949 年，包括清末时期、民初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共 45 年的发展历程，显现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阶段不同政党执政下国防教育不同的内容、形式与特点；二是指新中国成立至今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这一阶段又见证着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转型到“文化大革命”动荡再到改革开放后调整与提高的诸多印迹。

如果以 1985 年全面恢复学生军训试点作为当代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发展的历程，至今也已整整 30 多年了。当代高校对于国防教育的研究在多方推动下已有很多成果，课程建设成为大多数国防教育工作者研究的重点，从课程体系构建到课程建设诸要素特别是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的价值和地位、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及素质教育的关系、课程建设面临的困境、挑战与思考等等，长期以来都引发了国防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受诸多因素的限制，国防教育工作者中对学科建设的关注及研究相对滞后与不足。相比于国防教育的其他研究领域而言，国防教育史的研究少之又少，其中对于高校国防教育史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目前正式出版的主要著作有 1999 年清华大学杨邵愈主编的《高校国防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其中有一章简单归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国防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开启了国防教育史研究的基石；2005 年贵州大学徐则平、赵永伦、王华合著的《中国国防教育史》则对中国从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后几千年的国防教育史进行了全面的归纳与整理；2013 年厦门大学何锋的《中国国防教育史纲》则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分析历朝历代形成国防意识的教育行为上，以得出不同历史时期国防教育的特征与倾向。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少数研究国防教育历史的硕士论文，如 2006 年华中师范大学万际洋的《1927—1945 年南京国民政府学校国防教育研究》、2007 年云南大学吴建平的《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国防教育》、2008 年厦门大学张晓的《清末民初学校国防教育转型初探》等。

对于国防教育史特别是高校国防教育史研究较为缺乏的主要原因，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国防教育学学科尚未确立，对国防教育史的研究缺乏紧迫感，更缺乏研究的前瞻性和政策的指向性；二是高校国防教育史料的来源极其匮乏，在凡事追求效益的今天，已少有学者愿意坐冷板凳，在故纸堆中寻找其所需要的东西，更少有学者愿意花费数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去跟踪搜集相关的资料；三是史料的分布极为零散，由于高校国防教育自身定位的特殊性，故其相关史料有时会散落在各种教育史之中，有时会零星地出现在军事史或军事教育史里，在各高校特别是百年老校的校史中、在各教育名家或军事名家的回忆录中、在诸多学者文人的教育文集中等等都会有不同程度地涉及或反映，因此在搜集的过程中需要广泛涉猎相关领域，做研究的有心人；四是研究高校国防教育史的人员极度稀缺，学科创生的乏力致使目前全国高校尚无一支强有力的国防教育研究队伍，教师来源的多样化和学缘结构的多元化使得对高校国防教育史的研究少有问津，加上缺乏学术平台的支撑导致诸多从事一线教学的老师望而却步。

高校国防教育史的研究属于国防教育学科发展的范畴。但凡一个成熟的学科离不开三个方面基本理论的支撑：一是成熟并完整的原理或理论，二是清晰发展的历史脉络，三是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对于国防教育学学科创建与发展而言，同样需要成熟的国防教育原理或国防教育基础理论、国防教育史、国防教育学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还可延伸诸多子目录，如国防教育管理、国防教育课程论、国防教育比较研究、社会国防教育等等。这既是高校国防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当下高校每一位国防教育工作者应当承担的学术

使命。

三、中国历史上的国防教育

在中国古代早期,随着华夏民族的不断强大,逐渐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①的固定模式,《禹贡》将天下划分为甸、侯、宾、要、荒五服,其中“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②,周边各族被列入了化外之区,蛮荒之地。最早建立国家的华夏族自觉地对立于周边各族,大力强调夷夏之防,“防止以夷变夏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国防与国防教育的主要内涵和中心目的”。^③ 笔者以为,除了防止以夷变夏的国防教育目的外,自华夏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形成之后,历朝历代为保卫政权的稳定和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生产秩序,都确定了自身的国防政策,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军事及教育措施,在此过程中,早期军事教育(即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也就逐步确立了。

目前已知的具有建设和巩固国防目的的教育内容最早出现于夏初。战前动员成为当时极为有效的国防教育手段。《尚书·甘誓》记载了为打败有扈氏,夏启在甘之战前为激励士气发布了战斗动员令。誓词中说:“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唯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夏启借助上天之力讨伐有扈氏,并宣布赏罚分明的军纪军令,以此来调动民众的参战热情,最终取得了甘之战的胜利,从而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后期还创建了早期的学校,并在其中开展了与习武相关的教育活动。夏朝开启的战前动员和学校中的习武教育是中国古代国防教育的基本内容,并都为后代所沿用。至商朝,则“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④ 当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各方面人才,以加强阶级的统治。学校中文武兼习,习武重点体现在射与御中。据史料记载,商朝的军事教育不仅体现在本国范围内,还施教于邻邦在游学的子弟之中,“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以教戒”。^⑤ 戒的含义为持戈而警戒和持戈而舞蹈。西周时期学校教育趋于完备,已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都是为贵族子弟而设,主要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进行划分,在天子或诸侯都城的叫国学,在地方行政区划中设立的叫乡学。西周时期的教育内容比较规范,分“六德”“六行”和“六艺”。“六艺”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种主要技能,其中射和御皆属军事技能范畴,并被纳入人才选拔的内容。《墨子·尚贤上》记载:“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⑥ 除此之外,西周还盛行射礼制度,即国家各级政府组织的以射技为主的大比武,作为人才推选的标准。这些措施形成了社会上重视射御和尚武的良好氛围。

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式微,诸侯争霸,原先已由贵族向国人(即平民)扩展的学校教育

^①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② 《国语·周语上》

^③ 徐则平、赵永伦、王华《中国国防教育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37页

^④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第255页

^⑤ 《甲骨·卜辞》

^⑥ 《诸子集成·墨子闲诂》,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25页

受到了冲击,到春秋中期,东周王朝形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①的局面,“学校不修”,只有少部分诸侯国的国君如鲁僖公等还注重学校教育,但已改变不了官学废弛的现象。由于典籍的扩散,文化中心的转移,私学便在各地渐渐地发展起来,并开创了春秋时期新的学术文化之风,也为后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日渐兴起的私学中,以射、御为主的国防教育内容也包括其中,孔子教习射御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受社会尚武习俗的影响,对军事教育的重要性有较深刻的认识。他非常关心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曾明确指出国防建设的三大要素,即“足食、足兵、民信”^②,并总结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③他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也表现了“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④的基本态度。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变革也影响到了教育领域。在争霸目标与法治手段的相互作用下,“崇法尚武”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形成。在正规的军队教育之外,各国形成了人人都喜欢比武打仗的尚武风习,“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⑤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仅“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⑥,而且“焚书坑儒”,禁止私学,使战国时期辉煌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重创。在国防教育方面,他自认为天下和平,“不用兵革”“永偃戎兵”^⑦,下令废止了先秦时期留下的春夏秋冬四时的“讲武之礼”和在乡习武教战的制度,很快历二世而亡。汉初随着政治的逐步安定、经济的日益繁荣,文化教育也慢慢兴起,西汉时期军队典章制度趋于完备,汉武帝甚至提出“非教士不得从征”^⑧的要求,从而推动了军事教育的发展。但东汉末年,战乱频仍,西汉时期确立的习武练兵制度基本上又被废弛了。西晋的统一并没能带来长治久安,仅仅十余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整个国家长期处于争乱之中,甚至连军队形成的良好的选兵练将制度都被废除了。但就这样多个政权割据的局面中,仍然出现了像杜预这样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天文等诸领域知识于一身的军事家,他深感和平时期加强军队教育与训练的重要,提出“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攻破山夷,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⑨,意即要军事、文化教育并重。南朝宋、齐、梁、陈时期,由于内乱不断,尽管一些政权也做过努力加强教育,振兴武备,但因各种原因军队教育训练最终趋于废弛。北朝随着北魏的崛起,保持并发扬了游牧民族善骑的特点,从立朝之初就重视教育训练,从而练就了一支能以寡克众的精兵。北魏历代统治者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深感讲武备战的重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后来府兵制的创建打下了坚定基础。

隋朝结束了长达 300 年之久的战乱史,重新开创了一统天下的新局面。隋文帝在灭陈之后,立即诏告天下:“偃武修文”“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从而将国家教育重点由习武转为经文,使得武备遭到严重削弱,后虽开科举选士制度,但因隋炀帝的昏庸无道,最终流于形式,

^① 《左传》昭公十八年,《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435 页

^② 《论语·颜渊第十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 10 月版第 134 页

^③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915 页

^④ 《论语·子路第十三》,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 年 10 月版第 148 页

^⑤ 《商君书·赏刑》,世界书局《诸子集成·商君书》,1935 年版第 30 页

^⑥ 《过秦论》

^⑦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⑧ 《汉书·武五子传》,中华书局《汉书》(九),1962 年版第 2750 页

^⑨ 《晋书·杜预传》,中华书局《晋书》(四),1974 年版第 1481 页

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唐朝强盛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吏治清明、社会安全、文化发达、教育昌盛。在太宗李世民所定“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的治国方针指导下,军事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从对禁卫军严格的培养训练,到府兵分散与集中、平时与定期相结合的训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在前朝科举选将基础上创立的武举制的推广,唐前期营造了自上而下崇尚习武的浓厚氛围,对提高全体民众的爱军尚武意识大有裨益,致使唐代研究兵学之风盛行。著名诗人杜牧潜心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①,除为《孙子兵法》作注外,还著有《罪官》等治国、用兵方略,论述颇为深切中肯。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长期分裂混战的历史,并在历代王朝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实行“以文治武,兵权分立”的制度,以巩固宋政权。而后,随着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纷纷建立,对宋王朝的统治产生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宋仁宗时期开创武学,恢复武举;神宗时则正式建立武学,并在人才选拔培养、教学质量考核、教材选取及审定等多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开创了军校教育的先河,是中国古代军事教育制度的一大进步,同时也对社会及学校的国防教育带来了积极影响。元朝因是蒙古族所建,在其建国后的军队主力蒙古军中依旧长期实行兵民合一制度,即“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②,成年男子人人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因而也在整个社会形成了良好的尚武风气。明太祖在推翻元朝的艰苦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知识对建立政权的重大作用,故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立朝后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明朝的学校及科举制度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朝的武学不仅是培养武官子弟的机构,也是在职武官轮训的场所。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兵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反映了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显著提高。甚至有学者提出,将官并非专属武职所有,可从民间大量能人中进行挑选,这为散落在民间军事人才的擢升开辟了一条报效国家的通道。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有力地巩固了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度。但由于清朝统治者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固守以冷兵器为依据的国防教育的内容、方法,加上中后期制度腐败,军队无力戍守边防,民众整日昏昏于鸦片的麻痹之中,在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攻击下一败再败,任人宰割,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国防教育最早是“作为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后来逐渐从国民教育中分离出来”^③,根据教育对象,它主要分为面向军队、培养专业军事人才的国防教育和面向普通民众、培养民众国防观念的国防教育,学校国防教育就属于后者。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和水平的教育形式在汉初才具雏形,至唐宋则以书院为代表,所培养的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教育,宋朝武学的开办因其军校教育的专业性而不具备全民国防教育的特征,因而在数千年的古代中国已难以全面考察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国防教育的内涵及特征。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由于经历了多次由分裂到统一的过程,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思潮也在不断地融合,教育思想作为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始终恪守着统治阶级深深的烙印。在长达数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国家”、对“国

^① 杜牧《上李中丞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第 1081 册,《樊川集》卷九,第 825 页

^② 《元史》志·兵一,中华书局《元史》(八),1976 年版第 3508 页

^③ 薛连璧、张振华《中国军事教育史》,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168 页



防”、对“维护国防诸要素”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在对军队和民众进行国防教育时其目的、任务、手段等也存在诸多模糊之处，只有当统治集团认识到武备对维护国家稳定团结的重要性时，才会加强国防教育。对民众的国防教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有识之士包括统治者提出和平时期要保持忧患意识，否则民众的国家安全防线就会渐趋松弛。如清朝的康熙帝就非常注重对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的臣民加强国防观念的教育，特别是当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步步逼近并对中国进行侵犯时，他曾明确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①乾隆也教育臣民道：“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②二是通过重视国防，加强武备，宣传或如屈原般以文代刀，向天呐喊，或如班超般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等先进事迹，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使普通民众自觉地关心国家的安危，并能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以充分发挥国防教育在提升民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国防教育，它所倡导的爱好和平、崇尚武备、自强不息等国防意识与精神，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其专制统治的主要手段。国防教育成效大小与历代王朝的兴盛衰败密切相关。当然，作为中国古代漫长历史进程中的这一教育活动，因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轨迹，后人在研究时常会陷入国防教育概念与军事教育概念相混淆的困境，这是教育发展及认知者自身所难以避免和克服的。

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② 《十全记》，《清六朝御制诗文集》乾隆第三集卷八。

第一章

近代学校国防教育的滥觞

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是在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一次次凌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面临一次次严重威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国将不国的历史背景下,在一批批睁眼看世界、渴望学世界的有识之士的救国呐喊声中,在整个社会军国民教育思潮的推动下,伴随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诞生而出现的,并以兵式体操的形式存在于各级学校之中。作为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普通高校国防教育自发端起就走出了一条自上而下推行的发展道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教育救国思想的提出及初步实践

自 1840 年 6 月鸦片战争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封建落后的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面前再也显示不出天朝大国的威权,《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划定租界等等一项项领土、主权的丧失,仅仅半个多世纪就将历经数千年积淀起来的灿烂华夏文明之梦击得粉碎。在这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进程中,一批有识之士脱颖而出,其中不乏“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则表达了素有济世情怀的志士仁人的共同呼声。魏源在提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军事生产技术理念的同时,又针对当时教育制度的积弊,指出“国家欲兴数百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史例案,而图讦谟,图远猷始”^①,提出要革新教育,注重人才培养。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地位决定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举办现代工业、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翻译西学和西政等相关著述,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和军事、科技、法律及金融,力图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局面,从而走向自主自强,希冀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期间,清政府先后创办了一批外语、军事、科技、商业、农业等新式学堂,掀起了中国近代自主发展教育、希望以此培养人才,开启改变国运的新篇章。

1862 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轫。左宗棠最早提出了“学堂是造就人才之地”^②的教育思想。1866 年 11 月,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才也。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

^① 《魏源全集》第三册圣武记卷十一,岳麓书社 2011 年 2 月版第 507 页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28 页

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驭。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故在其有关船政事宜所罗列的十条清单中明确提出一项非办不可之事，即创设艺局：“兹居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在其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内附设开办了“求是堂艺局”（后改为船政学堂），专门用来培养造船技术人员和海军人才，成为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海军军事技术人才的近代学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各种洋务学堂初见成效。《申报》评论说：“故谓同文一馆，其所以裕人之才以储他日国家之用者，其效甚捷也。”^①新式学堂的设立，突破了传统人才的培养模式，拉开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序幕，较之传统教育，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进步。其中军事学堂的设立及军备教育的发展成为后来军国民教育的先驱。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国人感受到了与国外的差距，以此改变国运的主张应运而生。

王韬曾游历海外二十余年，深刻领会了《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哲学内涵，提出“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的思想。他强调设立学校、变革教育的重要性，建议设立“武备院、繁术院，用以教武科营弁，使之各成其材”^②。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批判：“窃以为其弊有五，请得而备论之……古者文武出于一途，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文以治国，武以扞难，犹之水火之性异而相为用。故古者射御并于六艺，而教之于学，所以使其娴于武事，一有征战，人皆知兵，可以据鞍而从戎。今之武人，率不知礼让为何物，儒者亦藐视武事，以为非我所宜知，于是文武分为二途，而士气之颓靡愈不可救。是其为弊四。……今在上者苟能留意于此，取士以德行道艺，则弊去其一。使儒通世务，吏知治道，则弊去其二。学其所仕，而行其所学，使悉其用，则弊去其三。文武归一途，儒知战阵，将知仁义，则弊去其四。使士专治一经，专学一事，随其材之成，官之终身，则弊去其五。五弊去而实材出，实材出而国势不振者未之有也。不然，学校之兴废，不关乎人材之盛衰，则其徒设为具文，不深可惜哉！”^③

张之洞在 1890 年创办了“两湖书院”，在其体育课程中将兵操训练列为主要內容，以培养学生的军事素养。“两湖书院”曾发给学生每人一套兵操训练的短衣短裤，每人一支毛瑟枪和十余发子弹。兵操训练的内容有步操、炮操、马操三种。兵操教官由军营中的军官担任，工程营的教步操，马队的教马操，炮队的教炮操。后来成为辛亥革命领袖人物之一的黄兴，就曾是“两湖书院”兵操训练积极参与者和骨干。^④他甚至认为“不习兵操，无以强身有为”。^⑤为保证“两湖书院”兵操教育的正常进行，张之洞还提出“应于该书院后余地，建设兵法体操棚，于功课毕后习之，先习简易诸式，如空手体操，及运动木椎铅椎、擎枪托枪推枪、超乘诸法，并先制备木质枪炮式，以资目验考究”。^⑥由此，开创了在学校开展兵操训练的先河。

^① 《申报》1878 年 2 月 21 日

^② 王韬《变法自强中》（光绪九年，1883），载于《韬园文录外编》卷二，光绪九年刊本，《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分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5 月重版第 57—58 页

^③ 王韬《论宜去学校积弊以兴人材》（《皇朝经世文统编》卷八），《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分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5 月重版第 60—62 页

^④ 陈英才《回忆两湖学堂》，见《湖北文史资料》第八辑，1984 年版第 28 页

^⑤ 蒋君章《百战功高黄克强》，载《黄兴传记资料》卷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57 页

^⑥ 张之洞《札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改定课程》，见《张之洞全集》第五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47 页



洋务运动中,一些开明人士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继提出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的建议,把促进留学教育、让更多的中国人赴海外学习作为拯救中国的手段。赴美留学归来的容闳深切地感受到清政府的腐败,认为可以此实施教育救国的计划。1867年他提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并提出了设兵工学校,“以为国家储蓄人材”^①等一系列具体方案。同时代在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界享有盛名的李善兰也关注到了国外的学校教育,他特别称赞德国的教育,认为其与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的思想不谋而合,“夫德之邻皆强国也,而德之兵,必出于学校,人人向义,故能胜之。窃叹德之用兵,何以甚合我中土圣人之教也,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德人其知之矣。今年德教士花君之安,以所著《德国学校论略》,介美国卫公使,问序于余。余展读之,始知德国之必出于学校者,不独兵也。盖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德国学校之盛如此,将见人才辈出,其国必日盛一日。”^②正是这种教育奠定了德国日后强盛的基础。

在各方面努力下,清政府制订了留学生章程,1872年,第一批30名留美幼童登上了赴美航船,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留学生。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认识到加强海防建设的重要,1877年起,赴欧学习轮船制造和驾驶技术的30名学生开始启程。1881年、1885年清政府又先后派出了10名、30名学生作为第三、第四批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派遣学生留学欧美,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这些学生在外期间,完全接受了全新的西式教育,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少人后来成长为优秀的人才,在外交、军事、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当然也因牵挂着清廷的命运,提出了一系列救国的理念和思想,传播文化知识、增强民众体质、提高民众素养成为教育救国的主要内容。甲午战后,日本又由“蕞尔小国”一变而成为中国朝野人士积极学习的榜样,1896年开始,清政府开始向日本选派留学生,到1898年留日中国学生已超过百人,20世纪初出现了赴日留学热潮。洋务派与海归派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思想及教育实践在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中国学校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各种军事学堂的建立不仅培养了一批专业化的军事技术人才,而且变革了中国传统的军事教育理念,但因其受众有限,没能完全唤醒当时国人中普遍存在的醉生梦死状态。1894年春,日本前文部大臣尾崎行雄在其所著的《支那处分案》中阐述了“最能探汉族致弱之病根”的警言,“国民之战斗力,保国之大径也。自历史上之陈迹徵之,支那人(指中国人)系尚文之民,而非尚武之民,系好利之民,非好战之民。今日支那之连战连败,其近因虽多,而其远因实在支那人之性情也”“以尚文好利之民,虽积节制训练之功,亦不能匹敌尚武民族……要而论之,支那人之战斗力,自今以往,其必沉沦于水平线以下矣。如斯民族,处今日战争最剧之世界,而欲保全其独立也能乎不能?!”^③这是当时一个外国人视角中的中国民众战斗力之现状。梁启超也对甲午战争以前的国民意识进行了如下概括:“吾

^① 容闳《予之教育计划》(同治六年,1867),《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分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重版第44-45页

^② 李善兰《德国学校论略》序(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分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重版第41-42页

^③ 蔡锷《军民国篇》,曾业英《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7页

国民不自知国之危也,不知国危则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卧,故于时无所谓保全之说。”^①可想而知,当时国人的孱弱已到了何种程度。

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说明始于洋务运动的自强之路并没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一时间举国上下发出了“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声,“内外文章,争献练兵之策”。^②就连在清军中任职的外国人也提出要改革军制,训练新军。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竭力主张学习西方,在其1894年所著的《盛世危言》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富强救国为目的,涵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领域的改革主张,对甲午战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政府无疑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1895年4月,袁世凯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提出:“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隶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权,扼要屯扎。认真整顿,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③时任北洋舰队总教习的德国军官汉纳根,建议清政府聘请洋将,仿德国军制“加练新军十万”。在内外改革中,清政府也看到了日本“专用西法制胜”,认识到只有组建一支强大的新式陆军,进行训练改革才能攘外安内,维护其封建统治。是年11月,清政府发出“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训练,成一大枝劲旅……实为救时之策”^④的上谕,从此,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随后还制订了一系列训练手册和章程,从而使新军建设走上正规化。

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如梁启超后来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如果说编练新军是通过先进而有效的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旨在从军事上救国,那么,一些有识之士则再次呼吁通过教育改革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特别是政界、思想界一些著名人物更主张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提升国民的爱国精神。1897年9月《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倡导“应广立学校,培植人材为自强本计”^⑤,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在《招考示》中指出“国势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⑥,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为后来推动变法传播了思想、培育了人才。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对“中学”和“西学”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不使偏废”的观点。就功能而言,中学的作用主要发挥在学生思想、品德、精神涵养、国家观念与政治信仰等方面,西学的作用则表现在物质建设方面,符合他所谓的“今日时局,唯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要义”。只有当受教国民有了正确的思想观念、民族文化涵养、忠君爱国情操与开阔的心胸,然后所学之西学专门知识与技能,方可有效发挥于正当的途径上。不然,会发生危害社会国家的行为。^⑦1899年,张之洞再次上书朝廷,对书院课程设置提出了改革意见,他认为“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建议加强实用科目的学习,删减经史内容,大量增加兵

^① 梁启超《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清议报》1899年3月22日,载田晓青《民国思潮读本》第一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② 《清史稿·列传二二九》

^③ 《袁世凯等致李鸿藻禀牍》,张晓生《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6页

^④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二十四,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6页

^⑤ 《湖南时务学堂缘起》,《知新报》第三十二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

^⑥ 《陈中丞招考时务学堂示》,《湘学报》第十六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⑦ 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6页